

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¹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创新

理论研究主要是由问题推动的，发现问题是实现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与“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关系”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独创”出来的理论问题。这两个问题构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成为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和核心问题。从这些学者们实际的研究看。“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主要是从哲学层次上讨论的；“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关系”主要是从具体社会理论层次上讨论的。前者比后者更具一般性。

迄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两个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视野之外的。按照国内学术界的某些看法²，我们可以把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区分为苏俄马克思主义形态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形态。由于各自的产生条件和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这两种形态有着较大差异，如苏俄马克思主义主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讨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满足对文化的需要；欧洲马克思主义主要立足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控制，以期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然而，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比较，苏俄马克思主义和欧洲马克思主义却又表现出它们在理论问题域上的共性，即都是讨论人类社会内部的地区性的或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严格地说，“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之外。虽然他们也谈论自然，但是他们或者停留在“自然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是由自然界的物质长期演化形成的”等论断上，或者以“人化自然”来代替对“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哲学的和广义社会学的研究。“自然”没有像“阶级”、“生产力”、“异化”、“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等范畴那样进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网络中，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甚至最基本的范畴。因此，“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问题也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和根本问题，“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当然也在理论视野之外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或“阶级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和理论要求。虽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然而，它们之间却不可能是被包含关系或被替代关系。研究“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有其独立的理论意义。

一旦把“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问题，这个出发点就有着与别的出发点不一样的理论要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活动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理论出发点不同，结果《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叙述结构与《历史研究》的叙述结构迥然不同，这显示了研究范

¹ 用引号来限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仅为了强调，在本文中，这股新思潮内部的各个学说性质是有待评定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本文作者全盘否定这股新思潮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尽管本文行文中初步肯定了某些学者的相关思想确实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

² 何萍：《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种传统》，载《哲学研究》，2003 年第 8 期。

式的不同。因此，把“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作为出发点，有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把“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出发点的，毋宁说，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开始经验研究，然后才上升到“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研究的。对于“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的研究，这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局限于从生态角度考察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于生态角度，并把这个生态角度的研究尽可能地与其它角度的研究如资本角度、阶级角度、文化角度等综合起来，以达到能更全面地考察资本主义这个目的。

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具体地、更个性化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时，由于知识背景、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者的目标和个性等原因，他们要具体解决的理论问题却体现出差异来。我们简单地列出他们的问题，以凸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般问题在各个研究者的具体研究中的差异性。阿格尔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实践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与美洲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在北美实现由阶级激进主义推动和建立起来的能消除生态危机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康纳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自然系统中的‘弱决定力量’向自然史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地带推进有多远？”和“当前的资本主义矛盾是什么？”。福斯特要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生态学的关系怎样？”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回避、排斥甚至否定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述和思想中是包含有大量的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及对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描述和思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用在于，立足于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对自然的自杀式的破坏等事实，力求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寻求理解和解决这些属于 20 世纪以来的普遍重大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正确地提出问题，“唤醒”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沉睡”的一股理论力量。这确实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

正确地提问并不意味着必然能够正确地回答。这句话适用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以阿格尔、奥康纳和福斯特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人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成果体现在三个层次上：（1）从“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出发，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或重构唯物主义；（2）以“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建构具体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与其它角度的批判之间的关系；（3）以前两个方面的研究为前提和基础，从理论和/或当代新社会运动出发，提出未来社会的特征或/和过渡到

³ 参见郭剑仁的《英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近况》，载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07》，人民出版社，2007 年 8 月。

未来社会的策略。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三个层次上都有很好的理论展开，而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各有侧重。这里，我们主要尝试对他们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性质做出分析，揭示他们的理论在有所创新、有所贡献的同时所具有的局限、甚至错误。

阿格尔是以他创立的“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两个概念来深化他对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的理解的。在他看来，“异化消费”是强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能为朝向社会主义的变革提供强有力的动力。阿格尔指出，20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发展为生态危机并由生态危机取代。阿格尔的这些概念和观点得以确立的前提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刺激起来的对商品的无限渴求与地球生物圈的有限的物质之间的冲突已构成一对矛盾，将引发生态危机，简言之，就是（对商品的单一性的）可能的消费的无限性与物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将引发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的避免或解决首先在于反思消费预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中的现实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由此激发出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及生态运动和当时由生态危机导致并加深的笼罩在西方社会人们内心深处的世界末日情绪近乎从天而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正是阿格尔第一次公开地预示了将作为未来马克思主义主流形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即将到来；不止于此，阿格尔还从经验研究中概括出需要的无限性与物质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创立概念，形成命题，展开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阿格尔的贡献。

然而，需求的无限追求与生物圈的空间范围内物质的有限之间的张力必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导致阿格尔意义上的生态危机吗？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对商品的需求可以几乎无限满足，另一方面又不过度破坏生态和环境？或者说，资本主义将怎样限制我们的需要以期不致引发生态危机从而确保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下又如何呢？本文认为，阿格尔的这个经验性的前提是不那么充分的。

需要首先是人的需要，是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文化需要，需要的满足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对象的，这是不会错的；而且当需要满足时，满足了的需要会产生新的需要。不过，我们还要认识到，以消费商品或产品为其主要目标的生理需要的满足及其它需要的产生是社会的、历史的甚至文化的。一定阶段的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有其特定的需要、满足需要的手段和产生需要的方式。抽象地看，个体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在可能方式上是无限的，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尺度和社会条件下，从生理和心理角度看，对物质对象的实际要求却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需要不会是连续的、直线的、无限的发展的。

地球上的物质是有限的，这是肯定的，因为地球的质量是一定的、有限的，即便有地球以外的星体会对地球的质量有所影响，从历史上看，这种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不会影响到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立场和内容。地球的物质是有限的，不过，从已有的人类经验看，地球上物质形态的可能变化却是近乎无限的，漫长的地质演化史和生命演化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物质形态变化的近乎无限的丰富性保证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以近乎无限多样的方式来利用物质。

当然，我们利用物质的方式也同样是历史的和社会的。封建的、古代的人只能利用畜力、人力，近代的人可以利用煤和石油等碳氢燃料获取比兽力和人力大得多的自然界的力。导致这些区别的因素主要是技术的发明和技术的使用方式。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的使用方

式下，有限的物质可以以比看起来多得多的方式被人类所利用，用来满足对物质的需要。有技术和技术的使用方式作为中介，有限量的物质与使用有限量的物质的方式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必然的对应关系，有限的物可以有相对更多的使用方式，最终，在人类可以利用的物与人类的需要之间达成平衡。因此，地球的有限量的物质并不等同于使用物质的方式是有限的。

因此，从逻辑上看，生态危机并不必然由阿格尔所谓的由经验概括出来的潜在的由对商品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引发出来。从经验事实上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出现了大量的生态危机的征兆（征兆不是危机）。西方社会针对征兆很快地行动起来，通过转嫁和改变，经过三、四十年的整治，西方世界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恢复了空气和水的清洁。在北美，并没有出现“期望破灭”，尽管消费仍然是异化的。这说明阿格尔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关系的具体分析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偏颇与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有内在关系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提问方式会决定回答的内容和回答的理论性质。阿格尔确切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具有经验上的狭隘性。他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北美如何实现能解决生态危机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提问方式本身把他的研究活动中所预设的经验空间范围局限在了北美。然而，北美是世界范围内的北美，北美与北美以外的地区发生着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阿格尔在研究北美的生态危机时，他是以全人类社会为背景的，但是，出发点和归宿点毕竟是北美，这种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就使得阿格尔失去一种视角：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他既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放到人类社会历史中考察，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放到在当前的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考察。失去了这两个维度，也意味着他很难真正地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发对资本主义作整体考察，即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来系统地内视。他只是抓住了消费的异化现象。确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消费主义行为正在形成并逐渐盛行，消费似乎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阿格尔抓住了这个与他的方法论保持一致的现象，然而，是什么促使消费主义兴起？对这个问题，阿格尔有所论述，却语焉不详。他忽视或回避了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关系的立场和观点，而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主义倾向上，对消费做了心理学的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解。

因此，从提问方式、预设的前提、作为回答的具体理论看，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很难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阿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人，然而，他却止于做了一个宣告。

与阿格尔相比，奥康纳的研究体现出的进步在于：“自然”成为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在考察“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时，立足于阐明新社会运动实践来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目标，奥康纳构建了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奥康纳构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前提是重构“生产条件”范畴，而“国家”和“自然”又是奥康纳重新定义“生产条件”的要件。在阐发“国家”概念及相关观念时，承接他自己在七十年代发展出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⁴，奥康纳赋予国家极大的相对自主性，这种相对自主性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甚至不再是被决定与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怎么理

⁴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5-346页。

解呢？奥康纳提醒读者高度关注如下事实：“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在正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官僚政治的国家，因此，它具有‘相对自主性’，换句话说，它是从属于其本身的内在趋势及矛盾的。”⁵以“国家的相对自主化”为前提，奥康纳讨论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官僚性的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运行的）分别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对特定的生产条件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条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之间的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政治及官僚化过程的作用力的总和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这种发生在资本、国家和市民社会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斗争，……影响国家对生产条件的生产和/或者管理。”⁶因此，“国家生产出了，或者说管理着获得、使用以及脱离包括‘环境’在内的生产条件的整个过程。”⁷如果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遭到了忽视，生产能力受到损失或者破坏，导致资本的生产力损坏，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应当归咎于国家机构及其政策，而不是资本本身。”⁸

总之，从理论上讲，奥康纳赋予了“国家”以极大的“权威”，“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用于协调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的”⁹，“国家”就是相对独立的存在，而“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就具备了以具有极大相对独立性的国家为中介的资本—国家—自然之间的结构。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如何展开的呢？资本会自我设置障碍。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导致了人类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异化、劳动的利用以及外在自然及“都市”资本化，¹⁰即奥康纳意义上的生产条件的恶化。生产条件的恶化会增加总资本的成本，总资本成本的增加带来资本的生产能力不足，这将引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冲突，表现出来就是资本生产不足。资本生产不足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类型的危机，它与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弥补或相互补偿的。新社会运动进行斗争的领域都是围绕着生产条件展开的。

应该说，奥康纳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条件的生产和管理过程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奥康纳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把本来不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生产条件当作商品来使用的现象，并阐明“生产条件具有主体化特征以及应该被赋予一种历史意义”，弱化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条件的技术决定论式的理解，强化了生产条件与生态之间的关系。¹¹这是要肯定的。

那么，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发展或补充呢？还是某种形式的修正？甚至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做着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概括起来，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的理论特征有两点：（1）强调国家的极大相对独立性，改变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国家范畴的本质；（2）创造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并以之与马克思

⁵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2页。

⁶ 同上，第245页。

⁷ 同上，第247页。

⁸ 同上，第237页。

⁹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3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

¹⁰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5页。

¹¹ 同上，第235页。

阐发的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也即利润的实现危机作了质的区分。这两个理论特征反映出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同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性质一样。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简洁明了地揭示出，国家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是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后者又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因此，具体的国家的性质和形式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当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时，上层建筑要或快或慢地跟着发生变化。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更是发展了这一立场和观念。国家的性质、形式和功能只能是被决定的，它不可能具有独立性，哪怕是奥康纳意义上的“相对自主性”。那么，自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后，资本主义世界又演化了一个半世纪，在这一个半世纪的演化中，资本主义的国家有没有自身发展出一种独立性出来呢？从当前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经验出发，以一种结构主义的眼光来看，国家确实表现出了对经济、文化、自然等方面的巨大力量和相对独立性，国家成为各种利益和意志相互妥协后的直接表达和表现。然而，一旦我们以辩证的眼光，从总体上看，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阶级调和或市民社会中各阶层力量调和的产物。国家仍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分别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各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等的研究尤为经典。奥康纳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不一样的，他的国家理论是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同样的，奥康纳建立的旨在解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类型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虽有一定的经验支持，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是奥康纳赋予了这个危机理论过高的理论价值。一方面肯定他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与第一重矛盾理论是相互补偿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第二重矛盾理论对第一重矛盾的主导作用。

在第一重矛盾中，起冲突的双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第二重矛盾中，起冲突的双方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条件。在第一重矛盾中，生产力是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在第二重矛盾中，奥康纳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国家”上，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以国家为中介的。生产条件的受损以及生产条件的恢复或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可见，奥康纳虽然也注意到生产关系，然而本质上，就他强调国家的作用而言，如其说他强调了生产关系，倒不如说他贬低了生产关系。我们可以说，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实质上也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并且这种反对还是以唯物史观的概念形式来实现的。

究其原因，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是与奥康纳的知识背景、理论立场和阶级立场相关的，同样的，也是与他的研究方法相关的，关于他的研究方法的性质，我们也将后面专门讨论。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与阿格尔和奥康纳的不一样。本文对他的相关思想的讨论也相应的做些调整。福斯特虽然也着力于当前的资本主义与生态关系的经验研究；但是，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真正着力点则是以思想史研究带动理论建构。具体地说，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理论贡献在于：1、阐发生态唯物史观分析方法；2、建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

历时一个半世纪仍然没有改变¹²。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福斯特贯彻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2、坚持了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福斯特作为一名里根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抵抗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及对第三世界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民众的剥削和压迫。他的博士论文是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经济学理论为研究对象。获得博士学位后，福斯特逐渐融入到每月评论学派（Monthly Review School）中，现在是《每月评论》杂志创刊以来的第三任主编。《每月评论》杂志是由保罗·斯威齐创立的以整个资本主义秩序为批判对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非赢利刊物。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从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研究。

以上福斯特的人生经历简介较充分地说明福斯特首先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脆弱的星球》和《反生态的资本主义》能充分说明福斯特在研究理论时，是采用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这特别体现在福斯特阐发的生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中。生态唯物主义肯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内在包含生态思想，科学的生态思想内在包含唯物主义这一观念和立场。生态唯物主义肯定了自然对社会的先在性和优先性，又肯定自然与社会的非同质性。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地、非还原论地、非决定论地看待自然和社会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福斯特认为，这一切都是内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的。

福斯特贯彻他阐发的生态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农业的历史和现实，建构了“物变换裂缝”理论。同时，福斯特建构起来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还体现了他的阶级分析方法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譬如，在分析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时，福斯特把农业危机的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大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这个内在动机。在分析当代的新社会运动时，他认为新社会运动与旧社会运动具有相同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态危机是这个根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新时期的新形式的危机类型，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力量则在于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新生社会力量与以前的阶级运动中的阶级力量合流后形成的新力量。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体现在：他的理论尚待系统化，也尚待与当前复杂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对后者加以解释说明。诚如一位哥伦比亚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福斯特的思想走在正确的路上，但生态唯物主义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与非洲的热带雨林中的伐木工人有怎样的联系呢？¹³。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得失

方法论的自觉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正确的方法是获得正确理论的必要条件之一，不合适的方法则几乎是导致理论出现偏差的充分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¹² 参见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二、三章。

¹³ 参见郭剑仁《探讨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10 期。

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¹⁴如果理论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方法的正确与否就更显得重要了，而评价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卢卡奇为什么如此地强调方法，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方法。摘引他的一段话是有必要的，他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有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¹⁵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或总体性方法。关于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不是这里的主题，我们就不谈了。这里，我们只是想强调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性。

马克思对他的研究方法是自觉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的1872年第二版跋，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分别较集中地阐述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

概括地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具体—抽象—具体。第一个具体是“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对这个现象的、表象的具体做出分析研究后，就会获得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即抽象的概念；获得概念后，再在头脑中、在思维中，研究这些概念的内在联系，把许多规定综合起来，达到多样性规定的统一，获得第二个具体，即精神上的具体。第二个具体不是第一个具体本身自动产生出来的，而是人用自己特殊头脑在头脑中对第一个具体的观念的再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他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区别是：它强调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这是以前的经济学家没有完成的过程。

以这个“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为指导，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比较简单的范畴（simpler categories）和比较具体的范畴（more concrete categories）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应当时刻把握到范畴只表现个别的侧面这个原则，强调确定经济范畴的次序的结构关系原则。此外，马克思还阐述了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观点，我们摘录下来，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本身以及用它作为参照来批判地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性质。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变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¹⁶，“在一定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¹⁷，“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

¹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¹⁵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智章、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页。

¹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¹⁷ 同上，第24页。

结构。”¹⁸

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指出了三点：1、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2、从历史上看，不同的社会形式中，总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而它的形式、性质和特征是变化的；3、确定经济范畴关系依据的是结构关系而不是自然次序或历史次序。这些观点是对具体—抽象—具体方法的深化和补充。可以说，马克思已给予了我们一个相对系统而又深刻的方法论。

对比马克思的方法论，阿格尔、奥康纳和福斯特的方法论的得失在哪里呢？

阿格尔强调他遵循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方法。如同卢卡奇一样，阿格尔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方法，理解为辩证法。但是阿格尔理解的辩证法与卢卡奇的不一样，与马克思的方法相比也是形似神不似。关于阿格尔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具体理解，这里不赘述。基于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阿格尔认为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关于异化和内在矛盾方面的看法是发展得比较成熟的，针对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实践，这些理论也是有效的，需要变化的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关于危机方面的理论。因此，阿格尔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消费现象和爆发出来的生态问题做出经验性的概括，并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失效，生态危机理论应取而代之。这就是阿格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方法或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方法。

阿格尔运用他的方法概括了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的显著现象，并尝试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种外在地与生态看起来有着直接关系的消费现象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生产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虚假消费，这种被刺激起来的消费主义是否意味着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已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马克思所注意到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从而消费决定着生产呢？这种消费现象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或已发生了质变？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吗？概括和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范畴之间的次序也发生变化了吗？以上这些问题都是针对消费和生态问题，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提出来的。然而，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是“视而不见”的，原因就在于，他虽对自己的方法论是自觉的，但他对“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或统一”的理解和运用是机械的和实证的，是非历史主义的，也不是真正辩证法的。在《狱中札记》的《理论与实践》小节中，葛兰西指出，“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中是会表现各种不同的形式，阿格尔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就具有属于阿格尔式的形式和实质，它是机械论的、实证论的。因此，最终落入了卢卡奇所说的平庸化和折中主义之中，阿格尔的方法谈不上对马克思的方法的继承发展或补充。而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真理成分也就由于方法的平庸而要大为减少。

奥康纳的文化—自然分析方法是具有其独到之处的，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他大胆地重新定义“自然”和“文化”，并尝试在理论层面上把他定义的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跟劳动过程结合起来。然而，当他想用波兰尼的思想来改造马克思的概念和理论命题用以解释新社会运动时，这个初衷就决定了他的方法是折中主义的，而他的理论也将是折中主义的。在吸收波兰尼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成果时，奥康纳的方法和理论就失去了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在他看来，现代的“文化”和“自然”既是自主的，又是累积性的。他以一种类似结构主义的眼光来透视现代社会，看到的是现代社会中文化、

¹⁸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5 页。

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彼此间的复杂的不分主次的相互作用，以“现代”的名义，否认这些社会要素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类似结构主义的眼光（一种强调同时性抛弃历时性的研究方式）只能是经验的、实证的，不可能是真正历史主义的。因此，从一开始，奥康纳就以一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解构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文化、自然等范畴，再用实证的、经验的方法来建构被他们解构的范畴。当他完成这些工作时，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只剩下了空虚的形式，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真内容。

与阿格尔、奥康纳相比，福斯特的方法更多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方法。福斯特首先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一个结构体系：认识论唯物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这种理解一定程度上能帮助福斯特一方面把握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获得一定的理论空间来阐述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解释。

在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资本主义与生态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时，福斯特都坚持了历史主义和总体性方法。他说过，他的研究是“从基础上重新开始”。他反对理论嫁接、折中，而他的基础性新工作就是运用已内化到他的思想中的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总体性方法，从马克思的文献出发，结合当代世界历史结构内的问题，梳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寻求一种能综合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新阐释。福斯特自己阐发的生态唯物主义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的方法的运用和发展，如前所述，他的生态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方法的原则。

福斯特的方法论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不象奥康纳的方法论那样明晰和便于理解与仿效。例如，福斯特建构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背后的方法论原则虽然与他明确阐发和宣扬的生态唯物主义方法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性不是很明晰，不易把握和运用。把这些方法论与宏观的社会现象和案例研究结合起来的环节或者说中间层次的理论也没有凸显出来。也即是说，福斯特还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在更具体的理论研究中具体化他的方法，让他的方法原则更明晰。

比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方法与马克思方法的异同，分析它们的得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方法论本质，从而也认清他们的理论本质。另一作用在于，从这种方法论的讨论和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拓宽马克思的方法对生态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和意义，同时在构建我们自己的方法论研究生态问题时，尽可能自觉避免方法论原则的偏颇。

鉴于当代（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中国范围内由生态的、资源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构成的社会—自然综合体的复杂性和发展不确定性不断增强这个事实，不言而喻，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文选取三个方面对三位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相关思想所作的评析算是借鉴他们思想的一种尝试。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发展着。为思考 and 解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深远的生态问题建构起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吗？本文以加拿大的本·阿格尔、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对这种重构的性质尝试做出评析，以期抛砖引玉。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创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与理论局限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得失。通过解读马克思的相关文献，本文初步判定，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抽象-具体 阿格尔 奥康纳 福斯特

Comment on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Guo Jianren

Abstract: The Marxism which Marx and Engel have founded has been developing by later Marxists. Is the reconstructing of Marxism by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regarded as the developing of Marxism insofar as the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hope to think and to resolve theoretically the far-reaching ecological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Marx' s approach? In this paper, I will have an attempt to comment on the characters of ecological Marxism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by Ben Agger, James O' connor,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who are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cent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since 1990s' . I will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the three authors' ecological Marxism by this way of giving the answer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how many new issues did they propose? How did they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Marx and reconstruct or develop the conceptions of Marx in order to answering theoretically the new issues proposed by them? How did they reinterpret the methods of Marx? Compared with the position and method of Marx, I judge preliminary that the Agger' s ecological Marxism is non-Marxism, O' connor' s ecological Marxism is anti-Marxism or again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oster' s ecological Marxism is insisting the method and position of Marx.

（郭剑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 哲学博士 副教授 邮编 430070

目前在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做驻所研究）